

## 信任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作者：[大卫·利普顿](#)

2018年5月10日



当人们选择信任且得到回报（即对政策、机构和体制拥有“信心”）时，经济将表现得更好（图片：iStock by Getty Images）。

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全球秩序充满疑虑和质疑的时代。我们看到人们对政党、各国政府、地区当局这些基础性制度的信心受到了侵蚀，国际贸易和投资伙伴之间的信任也受到了损害。

我们在使用“信任”这个词的时候，通常都十分随意。但 Luigi Zingales 等人在其严谨的研究中，将信任定义为“公民资本”，其指“帮助一个群体在追求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中克服‘搭便车’问题的持久且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

他们发现，当人们选择信任且得到回报（即对政策、机构和体制拥有“信心”）时，经济将表现的更好。

但当信任耗尽、当人们认为“体制”无法反映他们的价值、不受他们控制且不再为其造福时，经济将会表现不佳。

信任受损的原因大抵有三：

首先，这是对全球化的反应——或者更具体地说，这是对我们这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所出现的脱节现象的反应。许多人认为，全球化没有带来的公平结果，且缺乏对领导人和获益最大者的问责机制。

其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长达十年的缓慢复苏加剧了这一趋势。人们指责政府未能阻止危机，而危机后也未能迅速实现恢复，从而加剧了困境。对许多人来说，过去十年仅仅证明了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体制，腐败现象猖獗，而劳动人民却被迫收拾烂摊子。

人们对银行家有更深的愤慨——但讽刺的是，最近的调查显示，人们对银行的信任正在恢复。毫无疑问，这是危机后改革的体现，突显出了一个重要的教训：信任是可以重建的。

第三是技术。自动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纷纷崛起，每一个领域都拥有巨大的潜力。但它们也加深了人们对以下方面的担忧：未来的工作模式、现有商业的可持续性、网络犯罪的扩散以及数据的武器化。毫不奇怪，我们看到人们对互联网巨头的信任在降低。

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和政党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升温以及在许多国家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愤怒，可能是信任丧失最明显的结果。但是，目前存在一种更深层次的倾向——人们转向信任本地机构或处理单一问题的机构，这使他们觉得重新获得了控制感。这些机构包括公民社团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以及在线社区。

虽然“去中心化”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归属感和地方性的影响力，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不利影响。对地方和“去中心化”层面的信任越多，那些被信任者就越缺少权力与权威，以应对和解决那些从本质上需要集中权力和（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地区及全球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例如，人们对一些欧洲机构的信任下降，担心这些机构管的太宽。对超国家机构与监管的不满和疑虑导致在近期的选举中出现了强烈抵制。

欧洲的区域构建还不完整，因而面临着更多的脆弱性。欧洲尚未完成银行业联盟的有关工作，也未完全协调好各国的金融监管与实践，从而面临着信任被一步侵蚀的风险。从好的方面看，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可能会重建信任。难点是在降低风险（危机遗留问题和各国政策缺乏纪律）的同时需要建立起风险分担的要素。除非能够在二者间实现适当平衡，否则，如果某些国家的公民认为自己是付款方、其他人是收款方，则信任可能难以维系。

在全球层面，对全球性协议和机构的不信任，最明显地表现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人们转向双边谈判和协议，以及对单边行动进行讨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是避免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唯一可靠途径。但同理，如果全球化不是建立在自由和公平贸易投资的实践之上，那人们就不会持续、广泛地对全球化提供支持。这意味着有意愿根据全球经济不断提升的复杂程度（以及随着科技改变经济格局），相应地对规则和机构进行更新。所有国家都需要努力完善自身政策，共同努力来应对那些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的脱节情况。

基金组织对信任缺失并不陌生。我们始终处于危机与争议的中心。我们一再面临着改革的压力，以满足国际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望。在当前关于[全球金融安全网](#)（这是抵御未来危机的堡垒）的讨论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过去十年，基金组织采取了重要举措，使我们的决策更好地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变化，让新兴市场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

我们这项工作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更好适应来自全球各地的想法和不满——包括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是一个不断学习、持续发展且能够胜任的机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证明：我们仍有理由去超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为造福所有人的全球福祉共同合作。

在这个信任与权力日益分散的世界上，推行多边主义至关重要。我们这些多边机构已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我们重建信心的方式，是确保合作所带来的好处能让所有人切实受益，且这些好处能得到广泛的分享。如果我们着手让人们重新感到合作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能让人们重拾对有关机构和更大目标的信任。

\*\*\*\*\*



大卫·利普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他于 2011 年出任此职务。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他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并在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高级主任。他还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国际事务部长助理和副部长。此前，他曾在花旗银行任职执行董事，在全球对冲基金摩尔资本管理公司担任高级职务，并曾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职。他还曾担任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研究学者。

1989 年至 1992 年，利普顿先生曾与 Jeffrey Sachs 教授共事并曾在哈佛大学工作，为当时正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俄罗斯、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三国政府提供经济顾问服务。

利普顿先生拥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和硕士学位以及卫斯理大学的学士学位。